

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

编者按:今年是邹韬奋诞辰 130 周年。邹韬奋是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文化战士、先锋的青年领袖、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同时也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他被中共中央誉为“吾党的光荣”。毛泽东同志对韬奋精神做过精辟的概括:“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韬奋精神是一座富矿,是新闻出版方面的富矿、文化抗战层面的富矿,也是思想引领的富矿、文化传播的富矿,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化强国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各个角度重新审视、深度挖掘、大力弘扬。为了纪念邹韬奋诞辰 130 周年,我们邀请了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韩庆祥,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韬奋研究院执行院长、语文出版社总编辑龙杰,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韬奋精神青年宣讲团指导教师、人民日报理论部原主任编辑肖伟光,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韬奋精神青年宣讲团负责人张羽慧,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编辑王宇恒,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青年教师、《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理论与实践研究文集》作者之一的张乐,分别从邹韬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韬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邹韬奋的青年思想引领实践、韬奋精神的核心要义及其对当代出版业的启示、韬奋精神的文化蕴含等角度展开研讨,以期对韬奋精神丰富内涵的揭示与当代价值的传承添砖加瓦。

关键词:韬奋精神;文化主体性;企业家精神;管理思想;青年发展;出版事业

中图分类号:D64;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5)05-0017-18

邹韬奋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从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谈起

韩庆祥¹,肖伟光²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北京 100091; 2.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新时代我们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增加了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的。”^①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面对近代以来的社会剧变,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文化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文化抗战一面旗帜的邹韬奋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邹韬奋对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巩固,主要体现在其对革命文化的丰富上、对大众文化的传播上。

收稿日期:2025-09-26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 2025 版,第 291 页。

我们可以从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来谈起。

胡适是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但不少与其共过事、甚至崇敬过他的人,最后都选择了与他不同的道路。这其中,南陈北李和邹韬奋的选择最有代表性,前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后者则被中共中央追认为中共党员。如果说胡适与南陈北李分道扬镳是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自然分流,那么,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道扬镳则是抗战期间国统区文化界的自然分流。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知识界,胡适与邹韬奋是两颗耀眼的星辰——前者以北大为舞台,以理性启蒙的姿态推动社会改良,在新文化运动中骤得大名;后者以《生活》周刊为阵地,坚持“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和“竭诚为读者服务”,身体力行倡导“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笔柄千秋唤救亡”,是抗战期间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两人早年曾因共同的“改良”底色产生交集,邹韬奋更一度将胡适视为思想引路人。彼时的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问题与主义”论战中自由主义的代表,其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务实态度,以及对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坚守,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邹韬奋早年在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学习,后任职于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生活》周刊的初衷便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后,先后发表过五篇胡适的文章,还发表了二十多篇介绍评述胡适言论的文章。^①但邹韬奋后来清醒地认识到:“‘修养’不应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却要注意到社会性……是要以集团一分子的立场,共同努力来创造新的社会。”^②这一转变是邹韬奋在办刊办报实践中、在与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深刻互动中逐渐发生的,标志着邹韬奋本人对于大众文化的认知觉醒,是后来他高高举起文化抗战大旗、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前提与基础。

具体来说,邹韬奋自接手《生活》周刊后,进行了三次重要的导向性调整。第一次将其从内部机关刊物转变为面向广大青年讨论个人修养的趣闻杂谈,第二次转变为应着时代的要求关注社会问题,第三次转变为揭露黑暗现实、宣传爱国主义、倡导抗日救亡的舆论主阵地,成为在青年中有较大传播力的时事刊物。^③事实上,《生活》周刊从每期发行量只有两千八百份(其中多数还是赠阅),到发行量破万、破十万,特别是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际,邹韬奋迅速调整办刊方向,公开宣告“与国人共赴国难”,将《生活》周刊转变为以“团结抗敌御侮”为目标的“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销量增至15.5万份,创造了当时全国杂志发行量纪录,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在《生活》周刊办刊理念的转变过程中,邹韬奋与胡适也就渐行渐远。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表示,“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会导致社会的轻视和厌恶”,并且劝学生要“安心向学”。邹韬奋撰文批驳道:“有些人一再发挥知识的重要,力劝学生‘埋头’到课堂去。我们以为求知知识不在读死书,不在‘洋八股’,更不在养成‘顺民’式的教育;在民族这样危险万状的时候,知识须和民族的解放斗争联系起来,在实际行动和实践中才有真知识可以求得。”^④这次还是用“有些人”来指代的不点名驳斥。1936年,邹韬奋在《送胡适博士赴美》一文中明确指出:“胡适博士最近的政治主张,有许多地方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而且胡适博士一面主张把东北四省送给外人,一面又主张中央下令讨伐西南,薄于己而厚于人,也未免过火了些”^⑤,指名道姓、毫不掩饰。邹韬奋与胡适的分野,本质上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语境下,对道路选择与角色定位的不同回答。胡适始终将自己定位为社会的观察者与理性的建言者,他相信知识分子的使命是通过知识传播与制度设计,引导社会平稳过渡到现代文明。这种立场在和平时期或许具有进步性,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峻、底层民众苦难深重的时代,其渐进性与精英性难免显得脱离实际。邹韬奋则选择了行动者的道路。他从办刊、办书店到组织救亡运动,始终与普通民众站在一起,将民众觉醒视为社会变革的前提。他对胡适的疏离,不仅是对具体观点的否定,更是对“脱离群众的知识分

①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133页。

②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565页。

③ 参见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5版,第89页。

④ 同②,第512页。

⑤ 同②,第695页。

子改良”的超越——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与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通过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力量,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胡适当时早已经是学界名人、文化名流,邹韬奋作为一个年轻的出版人,与这样一位大人物直接对立,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①而作为一位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的爱国者,正是在与当时的文化名流的思想交锋中,邹韬奋完成了思想的蜕变与升华,完成了先进文化、大众文化的传播,在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事业上刻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

在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迸发出强烈的共同体意识,这种共同体意识体现为誓死不当亡国奴的强烈民族自尊、体现为强烈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所指出的:“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②在这个过程中,邹韬奋对于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大成绩,就是坚定不移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站在历史进步一边,通过办报、出版等方式,积极传播抗战文化、大众文化,揭露黑暗、弘扬正气,将文化传播作为民族战斗的武器、将大众传播作为唤醒同胞的利器,为“培育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就宣传教育的作用来说,韬奋对于同时代的影响,却比鲁迅还要来的普遍”^④,胡愈之的这个观察是很深刻的,看到了邹韬奋在“宣传教育”方面的独特优势与作用。邹韬奋所创办的《生活》周刊发行量达15.5万份,《大众生活》达20万份,《全民抗战》达30万份,生活书店遍布全国14省55城,成为当时最受青年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这些实打实的数字充分证明了邹韬奋是那个年代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青年所信任的媒体人、文化传播者。邹韬奋在《坦白集》的弁言中坦言:“在这集子里,关于团结御侮的文字最多,这是因为这个问题是中国当前最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我自忘其无似,尽我的一知半解,参加研究,以供国人参考。我所觉得欣幸的是这个问题现在已引起了全国人的严重注意和讨论。”^⑤这个无不骄傲的告白,袒露了邹韬奋心底最在意的永远是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邹韬奋在苏联考察颇受触动,加上在英国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从心底已经认同了马克思主义,认同了中国共产党。这种认同,在邹韬奋文字中最重要体现就是,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力量。“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邹韬奋笔下反复强调的一个关键词。“我们在这样艰危的时代,应该培养大众的伟大的力量”^⑥,因为“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象征”^⑦。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民族解放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少数自以为是的所谓精英或者虚无缥缈的外部势力,这是邹韬奋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1935年11月16日,海外流亡归来的邹韬奋创办了《大众生活》,明确提出:“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封建残余的铲除,个人主义的克服,这三大目标——在汪洋大海怒涛骇浪中的我们的灯塔——是当前全中国大众所要努力的重大使命;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⑧1936年6月7日,邹韬奋在《生活日报》创刊词中明确揭示:“本报的两大目的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也是从民众的立场,反映全国民众在现阶段内最迫切的要求。”^⑨“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或者说“努力促进民族解放,积极推广大众文化”,这就是邹韬奋的时代使命,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个时代使命。正如端木蕻良所说的:“韬奋先生和他所开创的《生活》为什么在全国人民心中有着这么广泛的吸引力,就是因为他代表了人民的力量,说出了人民要说的

①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135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032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633页。

④ 参见邹嘉骊:《忆韬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第153~154页。

⑤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585页。

⑥ 同上,第648页。

⑦ 同上。

⑧ 同上,第495~496页。

⑨ 同上,第668页。

话,成了人民要求抗战的代言人,因为他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便支持他。”^①

不仅是报刊。生活书店传播网络的构建,也是整个革命事业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样为抗战文化的大众化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一革命文化的堡垒成为当时国民党统治区进步读物的出版发行中心,并在抗战期间出版了大量的进步刊物和书籍,对于传播进步思想和抗日主张,冲破反革命文化“围剿”,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战斗阵地,引导广大青年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走上革命道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四百余种,而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出了二百种左右,其余为解放区的出版社所出。”^②三联书店在出版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1949年7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③这是党中央对三联书店、对邹韬奋的高度认可。1983年5月26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再次发文,指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及其联合后的三联书店,在建国前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其性质与新华书店一样,其工作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其经营目的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我党的方针政策,在扩大革命影响、唤起广大青年投身革命、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④(《关于确定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进步团体及三联书店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3〕34号)。三联书店与解放区的出版机构密切配合,为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

与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相呼应,邹韬奋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文化游击队”^⑤。邹韬奋还把生活书店员工比喻为“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⑥把自己办的报刊比喻为“喇叭手”“高喊当前民族应走的道路,怎样走法”^⑦。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大量报道并深刻分析与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形势,“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⑧,敢于为人民主持正义,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真正做到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⑨《抗战》三日刊全面反映人民大众在抗战时期的迫切要求,一度成为抗战时期旗帜性刊物,被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赞誉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⑩。“在这抗战的时期,笔杆应该和枪杆联系起来,文化食粮的供应应该和军火的供应配合起来”^⑪,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民族解放、一切为了人民利益,这就是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邹韬奋的文化自觉。

邹韬奋和他的合作伙伴,不仅成功构建起了大众文化的传播体系,为提振抗日士气鼓与呼,而且,还躬身入局,参与创立并推动了救国会运动的开展。1935年年末,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在上海发起成立救国会,致力于全国团结一致共同御侮的局面形成,次年11月遭到南京政府的拘捕、关押,史称“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事件”激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宋庆龄、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等国内外名流在内的声援与营救,为全民抗战局面的形成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这些史实是大家所熟知的。但是邹韬奋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很多人或许并不熟悉。举例来说。《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呼吁“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立即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⑫“我们现在

①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193页。

② 参见郝振省、魏玉山:《2012—2013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版,第256页。

③ 参见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版,第27页。

④ 参见《新时期组织工作手册》编写组:《新时期组织工作手册》,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487页。

⑤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797页。

⑥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629页。

⑦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356页。

⑧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九四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版,第420页。

⑨ 参见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5版,第76页。

⑩ 同①,第229页。

⑪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186页。

⑫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223页。

要先组织自己,用集团的力量,来负担我们时代的任务”,^①这类重要历史文献,邹韬奋都是重要参与者、领导者。在《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第二次宣言》中,救国会明确提出“反对文化统制,反对文化界汉奸”^②,旗帜鲜明地抵制文化奴性,争夺独立自主的文化话语权,要求文化自主权。当时,国民党政府压制新闻出版事业,采取封禁、取缔等手段对一切不利于自身的舆论进行打压,破坏了言论生态,扭曲了新闻媒体的价值作用。因此,救国会要求“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确保将国家民族遭遇的实际情形向读者、民众传播,以免当局政府混淆视听,欺骗民众,抹煞爱国运动的事实。此后,不仅上海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成立救国会,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共同体的形成,极大冲击了国民党当局的统治,也为促成国共团结合作提供了有利契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的《团结御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也是抗战期间很有影响力的一篇历史文献,该文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明确表示赞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毛泽东同志充分肯定救国会的主张,并发表公开信进行回应,代表中国共产党向邹韬奋等救国会全体会员表示敬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走向新阶段。同年9月18日,毛泽东同志又亲笔写信给邹韬奋等爱国人士表彰其英勇行动,并委托潘汉年同志代表中共中央与邹韬奋和救国会正式建立直接联系。此后,邹韬奋总是尽其所能寻找能够接触到的党组织指导实践,自觉以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推动工作,将整个革命的利益视为人生准则,毫无条件地服从于抗日救国全局需要。总之,在这个过程中,邹韬奋已经严格按照一位革命者的标准进行自我要求,全心全意为党工作,为冲破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化围剿、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书写了精彩华章。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经过二十八年浴血奋斗,党领导人民,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合作下,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③ 邹韬奋生前的公开身份是党外民主人士,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但事实上,他早就在思想上入了党。邹韬奋女儿邹嘉骊^④明确说过:“父亲信仰马克思主义,主要来自他流亡海外期间,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书馆认真阅读了很多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从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真正信仰了马克思主义。”^⑤而且,早在1938年,邹韬奋就郑重地向周恩来同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同志给出的答复是:“你现在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民党地区和国民党作政治斗争,和你以一个共产党员身份所起到的作用不一样,这是党需要你这样做。”^⑥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组织文化抗战、传播大众文化,这是我们党给邹韬奋的指令。可以说,邹韬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行中共党员之实,为在国统区积极推广大众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周恩来同志就曾经充分肯定邹韬奋的革命贡献:“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⑦对于邹韬奋文化抗战的巨大成效,给予了高度评价。毛泽东同志则如此评价邹韬奋:“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⑧我们完全可以说,邹韬奋的新闻出版实践、邹韬奋的文化抗战,极大巩固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高扬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⑨。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575页。

② 同上,第576页。

③ 参见习近平:《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版,第8页。

④ 邹嘉骊继承父业,一生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在韬奋著述的文献整理和韬奋研究的资料搜集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主持了《韬奋全集》的编辑出版,编著了《韬奋年谱》等韬奋精神研究的重要基础性文献,并曾出任韬奋基金会副理事长。

⑤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177页。

⑥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版,第279页。

⑦ 同上,第282页。

⑧ 参见雷群明:《邹韬奋研究(第3辑)》,学林出版社2008版,第488页。

⑨ 参见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5版,第4页。

论韬奋的企业家精神及其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

龙 杰

(韬奋基金会副秘书长,韬奋研究院执行院长,语文出版社总编辑,北京 100010)

在中国现代新闻出版史上,邹韬奋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更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所创办的生活书店及《生活》周刊等一系列报刊,在 20 世纪 30 至 40 年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堪称近代中国民族文化企业的典范。韬奋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和先进的经营管理思想,成功实现了出版的政治属性、社会属性与经济属性的高度统一与融合,为后世文化企业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实践经验。

一、韬奋的企业家精神:以爱国为魂,以服务为核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特殊技能(包括精神和技巧)的集合。它是创新意识、风险意识、社会责任感和组织领导能力的一种综合体现。邹韬奋的企业家精神,根植于深厚的爱国主义土壤,核心在于“竭诚为读者服务”,并贯穿于他对文化事业的全部热忱与实践之中。

(一)坚定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担当

韬奋的企业家精神首先体现在他将个人事业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的高度自觉。在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亡之际,他没有选择独善其身,而是以笔为枪,以报刊和书店为阵地,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明确提出,媒体的首要责任是“努力促进民族解放”^①。

他接办《生活》周刊后,迅速将其从一份侧重于职业指导的刊物,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②。九一八事变后,他更是以犀利的笔触,猛烈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大声疾呼团结抗日,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他创办的生活书店,也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机构,更是传播进步思想、凝聚抗日力量的文化堡垒。生活书店前身为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1932 年 7 月在上海成立,对内为生活出版合作社,秉持“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原则^③。这种将企业发展与民族大义相结合的格局与担当,是韬奋企业家精神最鲜明的底色。

(二)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

创新是企业家的核心特质,邹韬奋在出版领域的创新实践堪称先驱。在内容上,他打破了当时报刊沉闷刻板的局面,主张文章要“有价值、有趣味”,贴近大众生活,关注社会热点。他开创“读者信箱”栏目,亲自回复读者来信,拉近了媒体与受众的距离,极大地提升了刊物的互动性和影响力,该栏目相关文章后汇编为《该走那条路》《莫迟疑不决》等著作。

在形式上,他对《生活》周刊的版面、字体、插图等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使其更加美观易读。在经营模式上,他从一个小小的“书报代办部”起步,逐步发展成为拥有五六十处分支店及办事处的全国性连锁店——生活书店,大量出版马列主义进步书刊与抗战读物,开创了中国现代出版发行网络的先河。这种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我们要怎样办》(生活日报),收录于《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五号,1936 年 7 月 5 日出版。

② 参见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 版,第 68 页。

③ 同上,第 117 页。

不拘一格、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是他事业成功的关键动力。

(三)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

企业家精神中不可或缺的是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执着。邹韬奋的出版事业始终伴随着来自反动势力的巨大压力和迫害。《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等刊物先后被国民党当局查封,生活书店在国统区的五十余家分店也被陆续查封。他本人更是两次流亡海外,甚至身陷囹圄。

1936年11月,邹韬奋因发起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积极呼吁抗日救亡,与沈钧儒、章乃器等6人一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史称“七君子事件”,直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才获释。

然而,每一次挫折都没有击垮他。刊物被封,他就创办新的刊物;书店被关,他就设法恢复;被迫流亡,他就在异地继续战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所谓‘干’,是继续为中国的民族解放而奋斗。”^①这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愈挫愈勇的坚韧毅力,是韬奋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核心理念

如果说爱国是韬奋精神的灵魂,那么“竭诚为读者服务”就是其企业经营的基石。他曾明确表示,办刊物、办书店,目的是“求有裨益于社会上的一般人”。他将读者视为上帝,不仅在内容上满足读者需求,更在服务上力求极致。

生活书店设立了专门的读者服务部,为读者代购书籍、代办邮购,甚至提供咨询服务。他亲自处理读者来信,了解读者的思想动态和实际困难,并将这些反馈融入编辑工作和图书出版中。生活书店以“促进文化、服务社会”为主旨,“生活精神”可概括为“坚定、虚心、公正、负责、刻苦、耐劳、服务精神、同志爱”^②。这种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赢得了读者的广泛信赖和深厚感情,形成了庞大且忠诚的“奋粉圈”。即使在他流亡期间,许多读者仍追随其思想,成为他事业最坚实的后盾。

二、韬奋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理念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邹韬奋不仅具备卓越的企业家精神,更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套系统且富有成效的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这些思想不仅指导他成功创办和运营了生活书店及一系列报刊,其精髓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内容为王:打造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核心产品

在邹韬奋的经营思想中,内容始终是第一位的。他深刻认识到,文化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思想性、可读性和社会价值。他一生创办了六刊一报,几乎都成为当时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媒体。生活书店先后出版了一千余种图书,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抗战图书的出版阵地。他为《生活》周刊确立的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③。在不同历史时期,他的刊物总能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社会关切。

九一八事变后,《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成为舆论界的一面旗帜;抗战时期,《全民抗战》等刊物则成为宣传团结抗战、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阵地。他要求稿件“言之有物,不说空话”,并亲自撰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小言论”,以其鲜明的立场、深刻的见解和通俗的语言,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他支持出版《资本论》等书籍,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种对内容品质的极致追求,使他的报刊和图书具有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同时,邹韬奋自己更是优秀内容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在《生活》周刊等刊物上撰写“小言论”专栏,影响深远,是其思想传播的利器。这些短文篇幅虽小,但观点鲜明、文笔犀利。他以通俗语言剖析时事,

①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全集(第1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156~158页。

②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全集(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428页。

③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56页。

将深刻道理融入日常,深受大众喜爱。

他著作等身,撰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大量著作。这些作品记录了他对国内外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向国人介绍世界大势和进步思想,进行思想启蒙。这些著作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

他是编作合一的典范。正因为此,他身边得以聚集一大批当时最优秀的作者,形成文化影响力和风向标。

(二)人才为本:构建志同道合的专业团队

邹韬奋深知,文化企业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他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致力于打造一个志同道合、专业高效的团队。他选拔人才的标准,首先是“人品”和“学识”,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民族的忠诚和对文化事业的热情。

在生活书店内部,他营造了一种平等、民主、互助的工作氛围。他推行公平公正的用人制度,不拘一格降人才,许多有才华的年轻人在他的培养下成长为出版界的骨干。他还建立了完善的培训体系,通过业务学习、经验交流等方式提升员工素质。他曾说:“我们的书店,是要成为一个培养出版人才的大学校。”^①这种以人为本、重视团队建设思想,为生活书店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品牌引领:塑造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邹韬奋就已经具备了强烈的品牌意识。他为自己的企业和产品精心打造了独特的品牌形象。“生活”这个名字,简洁明了,朗朗上口,既贴近大众生活,又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极易被读者接受和记忆。

生活书店的店标设计醒目,辨识度高,无论在上海的繁华地段还是在偏远的乡镇,只要看到这个标志,读者就知道这里能找到他们需要的进步书籍和刊物。他通过持之以恒的优质内容和服务,使“生活”品牌成为了进步文化的象征,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和尊重。这种强烈的品牌意识和成功的品牌塑造,是生活书店能够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作为一线作者,他最了解读者需求和社会痛点。这种体验使他在策划选题、编辑刊物时能精准定位。他能确保出版物既有思想深度,又能引发广泛社会共鸣,实现产品销售和品牌影响力的双重提升。

(四)连锁经营:构建全国性的发行网络

在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开创性地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模式来拓展生活书店的业务。他深知,要扩大文化影响力,就必须打破地域限制,让进步书籍和刊物能够到达更多读者手中。他从在上海设立第一个“书报代办部”开始,逐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乃至一些乡镇建立了分支店和办事处。

这些分支机构统一标识、统一进货、统一管理,形成了一个高效运转的全国性发行网络。这种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图书和报刊的发行量,降低了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它将进步思想传播到了全国各地,为凝聚抗日力量、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生活书店是中国近代民族文化企业中最早成功运用连锁经营模式的典范之一。

(五)制度保障: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营机制

邹韬奋非常重视企业的制度建设,他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有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才能确保企业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运转。在生活书店,他建立了一套相对规范的管理制度,包括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业务管理制度等。

他特别强调民主管理和集体决策,每周定期召开例会,讨论业务发展、选题策划、读者反馈等问题,集思广益,共同决策。这种例会制度不仅保证了信息的畅通和决策的科学性,也培养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即使在他本人不在书店主持工作期间(如流亡海外或入狱时),书店的各项业务依然能够有序进行。这种以制度为基础的规范化管理,体现了邹韬奋作为企业家的远见卓识。

^①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全集(第1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312页。

(六)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实现文化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邹韬奋的经营管理思想中,最核心也最具前瞻性的一点,是他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他明确指出,文化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商业企业,它肩负着传播思想、启迪民智、服务社会的重要使命,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他创办的报刊和书店,始终以宣传进步思想、推动社会改造为己任,不计较一时的经济得失。作为一线作者,他最了解读者需求和社会痛点。这种体验使他在策划选题、编辑刊物时能精准定位,确保出版物既有思想深度,又能引发广泛社会共鸣。但同时他也深刻认识到,没有经济效益的支撑,社会效益也难以实现。他通过高效的管理,实现内容与传播的无缝衔接:他既是内容的生产者,又是传播的主导者。这种双重身份让他能将自己的思想主张,通过自己创办的媒体和书店,直接、高效地传递给目标受众,形成从思想到传播的完整闭环。在坚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方式,通过提高发行量、拓展销售渠道、优化成本控制等手段,努力实现企业的盈利。生活书店在他的经营下,不仅成为了传播进步文化的重镇,也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生活》杂志1924年创办,1933年发行量达到15.5万份,成为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创下了当时中国杂志的发行纪录。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

三、韬奋精神的当代价值:文化企业发展的宝贵财富

邹韬奋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企业家精神和文化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至今依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对当代中国文化企业的发展和编辑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

在当今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时代,许多文化企业面临着如何平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如何提升品牌影响力等问题。邹韬奋的实践告诉我们,文化企业必须坚守社会责任,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运、人民需求紧密结合,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必须坚持内容为王,打造高质量的文化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和读者;必须重视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必须树立品牌意识,创新经营模式,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必须不断与时俱进,始终面向行业前沿,才能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文化力量。

今年是邹韬奋诞辰130周年。韬奋精神已经成为中国新闻出版事业的一面旗帜。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韬奋新闻奖”“韬奋出版奖”,是中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个人成就奖,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新闻出版工作者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而不懈奋斗。

四、结语

邹韬奋是中国现代史上伟大的爱国者、卓越的文化战士,更是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和成功的文化企业家。他以坚定的爱国情怀、锐意创新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坚韧毅力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核心理念,诠释了一位优秀文化企业家的精神品质。他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以内容为王、人才为本、品牌引领、连锁经营、制度保障以及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为核心的经营管理思想,不仅成功指导了生活书店等文化企业的发展,更成为了中国近代文化企业经营管理的宝贵财富。

在新时代,我们更应该学习和传承韬奋精神,将其融入文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推动中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邹韬奋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正的文化企业家,不仅能够创造经济价值,更能够创造深远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他的思想和实践,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爱国与服务:韬奋精神的两个要点

张羽慧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上海 200240)

学界与业界多年来对韬奋精神的研究,基本形成了对其内涵的共识,包括服务精神、爱国爱民精神、奉献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敬业精神等。爱国精神与服务精神在韬奋精神中居核心地位,是在历史与现实发展下形成的记忆构建、话语传递,一直以来作为新闻出版人、新闻出版业的精神灯塔,影响深远。爱国是邹韬奋书写一生的长卷,他将为国为民作为推动文化事业进步发展的价值追求。对邹韬奋爱国精神与报国事迹的肯定,在学术研究和纪念仪式中不断明朗,也逐渐走向台前。从 2005 年合并设立“长江韬奋奖”,到 2014 年邹韬奋入选首批“全国百名杰出抗日英烈”,表明邹韬奋的成就已经从新闻出版行业的标杆提升到爱国救国的英雄楷模,凝结在他身上的精神遗产,不仅有服务大众的躬身为民,也有感动人心的爱国情怀。当前学习与研究韬奋精神,应深刻理解其爱国精神与服务精神的内在逻辑,感悟韬奋精神穿透时光的动人力量。

一、爱国精神是服务精神的价值前提

邹韬奋首先是一位真正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根植于他对家国天下的文化基因的继承。邹韬奋幼时接受严格系统的私塾教育,熟读儒家经典,在南洋公学求学期间对国文课深感兴趣,写作水平取得了长足进步,被教师们称赞为“学识精研通达,性情谦逊韬晦”。深厚扎实的传统文化教育,赋予了邹韬奋强烈的家国情怀、忧患意识与责任担当,承袭了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邹韬奋的爱国主义思想,还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表现为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对社会革新的渴望,且这一思想借助其躬耕的新闻出版事业得以广泛传播,又在九一八事变后更加强烈,让邹韬奋义无反顾加入抗日救亡的爱国运动大潮。

邹韬奋为大众服务的逻辑起点是培育和壮大民众中的进步力量,为推动社会变革创造生力军。邹韬奋曾说办报刊是“以社会的改进为鹄”,他试图用大众化的新闻出版事业影响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以思想浪潮推动社会进步,以“精神粮食”开出一剂救国药方。《生活》周刊的宗旨“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也提示我们,韬奋的新闻出版思想带有教化大众的色彩。提倡服务精神,在于引导民众从个人角度看出去,以“为群为公”的精神推动社会扩大“光明面”。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邹韬奋为挽救民族国家而奔走呼吁,发挥“舆论机关”凝聚思想共识的作用,同时,激荡的时局也促使邹韬奋寻找更加革命性的救国道路。

1933 年至 1935 年间,邹韬奋受局势所迫,开启流亡生活,他在流亡国外时仍牵挂国内的抗日救亡工作,深信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胜利、民族解放的前路所在,呼吁各方重视大众抗战的力量,在全民族抗战的浪潮中发挥大众的伟大力量。在对欧美、苏联的社会考察中,邹韬奋的思想产生了重大转变。在对比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百态后,邹韬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理性与情感上的深深认同,更有以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心之向往。1935 年,邹韬奋结束流亡回到上海,此时抗日救亡运动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随即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毫不畏惧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严酷审查与摧残,接连创办《抗战》《全民抗战》等

报刊,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阻碍团结抗战,对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等背叛民族利益的恶劣行径,大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共御外侮”的抗战主张。邹韬奋成为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重要的言论主将、舆论领袖,在他的爱国旗帜下,不仅集结了一大批左翼进步文人,更直接引领了无数爱国青年投身抗战。

爱国精神是邹韬奋自身价值观的根基,是他从事大众化新闻出版业的缘起,是他带领战时青年爱国救国的嘹亮号角。只有把握爱国精神在韬奋精神中的基础地位,才能更好理解邹韬奋坚持奉行服务精神的价值追求。

二、服务精神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毛泽东同志曾评价邹韬奋: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理解邹韬奋的服务精神,应体会其热爱人民的真挚情感、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

邹韬奋胸中澎湃的爱国壮志有着具体而微的一面,即对人民大众的博爱。他曾说“推母爱以爱我民族与人群”^①。一方面,这种母爱式的爱民情感饱含着慈母怜子般的关怀熨帖。邹韬奋对报刊受众有着敏锐的觉察和真诚的体恤,他将目光投向学徒、小贩、职工、学生等当时社会地位低微的边缘群体,深切关注他们的所思所想,并致力于培育这股不受重视但蕴藏潜力的社会力量。考虑到当时受众群体的文化水平和经济情况,邹韬奋推崇“明显畅快”的文风,使文章更加通俗易懂;在物价上涨时期,邹韬奋和其报刊同仁控制成本、开源节流,保证了报刊价格不上涨。另一方面,这种爱民情怀也如严母望子般的费心教导、悉心指引。他鼓励人们用奋斗换来人生的光明前途,高呼“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②,邹韬奋相信大众、依靠大众,把大众看作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主力军。

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邹韬奋服务精神中的价值导向。一是邹韬奋对传统民本思想的承继,使其怀揣民为邦本、救民济世的情志与操守,同时他追求进步和革新,摒弃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与封建旧体制和落后文化习俗对人的束缚是彻底割席的。正如邹韬奋对忠的解读:“‘忠’的最大意义是忠于国家、忠于民族”^③,忠于民族国家而非忠于一姓之兴亡。他主张每一个青年学生、爱国民众都应“了解时事,训练自己,教育别人,努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④,体现出将自身发展、利他发展、为国发展相贯通的思想内核。二是邹韬奋在新闻出版的实践中始终坚守民众立场。邹韬奋视服务大众、唤醒大众、教育大众为新闻出版事业的良心,为所有从业者的天职。他尽心竭力肩负起培育民众的重担,启蒙大众思想、唤醒民族自尊、号召团结抗日,邹韬奋“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精神,也让他赢得了民众的追随与敬爱。

三、服务精神是对爱国精神的价值实践

邹韬奋笃信实干救国,服务精神是邹韬奋统一人格与报格、平衡理想与现实的实践法宝。他对服务精神有这样的阐释:一是尽忠竭诚,是指要“尽着最大限度的努力”把服务这件事“做到我们无法做得更好为止”^⑤;二是大公无我,他将“完全大公无我的对社会服务的精神”^⑥作为事业的生命线,达到了无私奉献的境界。

尽忠竭诚的服务对象是大众,服务内容是一切于读者、于社会有益的事。邹韬奋将倾听民声、为民排忧解难做到了极致。他曾说:“必须在实践上帮助读者解决种种困难,凡是在自己力量内所能勉力办到的事情,必须尽忠竭诚为读者办到。”^⑦邹韬奋开设“读者信箱”和“小言论”两个专栏用以回应读者来信和社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7》,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4页。

②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649页。

③ 同上,第654页。

④ 同上,第423页。

⑤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9》,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124页。

⑥ 同上,第687页。

⑦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893页。

会话题,这也是新闻出版业内较早重视与读者互动的举措。作为周刊主编,邹韬奋在繁忙的工作中始终用“全副精神”解答读者的来信,他曾形容看信是“极有兴味的工作”,就像在“倾听好友的衷情”,把回信当成与许多好友的谈话,可以说是乐此不疲。同时,邹韬奋还将自己最多的精力和心思花在撰写短小篇幅的时事评论上。邹韬奋对读者回信和社会话题的“竭思尽智”正是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博爱,源于他服务人民利益的民众立场,也是这种“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似的‘服务精神’”^①让邹韬奋和他主办的刊物为广大读者所爱护、支持与信任。邹韬奋将这种贡献社会、服务读者的服务精神视作“唯一动机”,在办报办刊、经营书店的方方面面践行着服务精神,发挥新闻出版事业对国家民族更加广泛而深刻的作用。

邹韬奋在新闻出版的经营实践中坚持以社会价值为先。他主张事业性重于商业性,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适应进步时代的需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经营所得的经济收益继续用以服务和支撑事业发展。邹韬奋推崇“为群为公”的公共精神,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他在所办刊物上发表文章从不拿稿费,宁可自己带头每月降薪,也不提高刊物售价。同时,他坚持经营报刊、书店不为任何个人和机关牟利,也就保持了不受干扰、不被操纵的独立性。面对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威逼利诱,邹韬奋为民族大义、舆论正义抗争到底,保全了刚毅正直的人格,仗义执言的报格。生活书店负责人艾寒松这样评价邹韬奋:“先生一生尽瘁文化事业,持身清廉,毫无私蓄,且亦从不计及个人利益,在《生活》周刊及生活书店先后工作十余年如一日,大公无私,一丝不苟,律己严,待人宽,诚恳坦白,对青年倍加爱护。”^②这种大公无我的办刊宗旨与处事风格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信任,让邹韬奋的身边总是围绕着志同道合的友人、同事与进步作家,得以助力这份赤诚爱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壮大,影响深远。

邹韬奋所践行的服务精神,是掂着这支“秃笔”对社会和国家担负应尽的最大贡献。他始终如一地竭诚、无私为读者服务,得以搭建起最广大而可靠的民众网和公信力,最终激发和凝聚起全社会,尤其是广大爱国青年的救国共识。

“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邹韬奋为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命运,废寝忘食、奔忙操劳,创办数本刊物,运维56家生活书店(至1939年,生活书店先后在武汉、广州、西安、重庆、长沙、成都、桂林、兰州、贵阳、南昌、昆明、福州等处开设分支店),写下近一千万字的文章论著,这些数字让后人称赞。我们常常看到邹韬奋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事业成就,慨叹他所创造的刊物业绩、出版品牌、销量奇迹,但韬奋精神留给我们的更是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激荡起我们心中对高尚人格、钢铁意志、博大胸襟的景仰和敬意。他既是心怀家国的爱国赤子,为了捍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反动势力的记恨与迫害,以至流亡海外、被捕下狱,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然坚持爱国救国的正确道路。他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英勇战士,全面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主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他的遗嘱里有着“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的恳切。邹韬奋去世后,中共中央发去的唁电中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并高度肯定他为“吾党的光荣”。邹韬奋还是苦难民众、爱国青年的守护者和代言人,他相信民众、鼓舞青年,将国家的希望寄托在大众身上。“读者信箱”和“小言论”满含邹韬奋对民众的关心和指引,既与苦难大众血泪同泣,又同热血青年并肩赴难。这样的回信和声援,留给后世可查的就有近670篇。当邹韬奋因为疾病骨瘦如柴、形容枯槁时,他仍在病榻上为了民族国家的出路发出最后一次呼吁。

邹韬奋真正诠释了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信条。他的一生深刻昭示着:以爱国精神为价值前提,以服务人民为实践路径,二者相互支撑、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韬奋精神最坚实的内核。这份穿越时空的精神遗产,不仅塑造了新闻出版事业的精神品格,更为一代又一代人树立了报国为民的精神标杆,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韬奋精神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凝聚民族力量的永恒指引。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894页。

② 参见邹嘉骊:《忆韬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第46页。

韬奋精神的核心要义及其对当代出版业的启示

王宇恒

(宁夏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编辑,宁夏银川 750001)

邹韬奋先生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撰写、编辑、出版了众多爱国救亡、团结抗日的文章、刊物、书籍,从一名普通的编辑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和鞠躬尽瘁的出版事业楷模,既坚持对知识的守真与严谨,又注重传播与传承,给当代出版业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韬奋精神是邹韬奋在新闻出版事业中秉持的爱国精神与职业操守的集中体现。《韬奋精神六讲》指出:“韬奋精神又是丰富的。韬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真诚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坚持真理、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以及正确处理新闻出版的事业性与商业性关系,善于经营,精于管理,爱岗敬业,等等,都是韬奋精神的重要内容。”^①这些丰富内涵贯穿邹韬奋的毕生经历,凝结成了深沉浓厚、赤诚热烈的爱国精神,从不妥协、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和矢志不渝、奉献终生的敬业精神,共同构成了韬奋精神的核心要义。

一、深沉浓厚、赤诚热烈的爱国精神

邹韬奋一生以笔为剑,“爱国”二字深深刻在他的骨血里,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不同特征。一是在求学时期,邹韬奋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朴素、真挚、昂扬,同时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邹韬奋发表文章《青年奋斗之精神与国家前途之希望》,志气昂扬、感情充沛,呼吁青年身体力行、自强自立,大笔挥出对青年奋斗精神的认可和期待,以及要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志向,形成了融合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学说、中华民族传统精神文化精髓的独立人格精神。二是流亡海外时,邹韬奋的爱国之心表现为为了祖国坚持探索救亡图存之路。1933年,邹韬奋在遭受国民党迫害、被迫流亡海外期间,深入考察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集中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感受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建设的源源动力和民众的团结、向心力。1935年,邹韬奋在伦敦撰写《萍踪寄语三集弁言》,标志着邹韬奋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②。在这个时期,邹韬奋写下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文字。这些文字一经发表、出版,就在民族抗日救亡战线中掀起了一股红色浪潮。三是流亡回国之后,对祖国和民族的热爱使邹韬奋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阶段,邹韬奋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继续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对党的方针路线有了更明晰的认识,并以赤诚热烈的文字奋然有力地开展出版工作,举起了鲜明的救国旗帜。后来,邹韬奋耳部疾病愈加严重,但在病榻之上仍然执笔发声,直至病故。临终之际,邹韬奋在遗嘱上签下姓名,“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③。

二、从不妥协、永不屈服的斗争精神

“就是我深信没有气骨的人不配主持有价值的刊物,区区既忝主本刊笔政,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2025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版,第2页。

②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485页。

③ 同上,第459页。

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伏的。”^①邹韬奋铁骨铮铮,他手执笔杆子却像是拿了枪杆子,为了大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时刻斗争。他坚决揭露奢靡享乐的贪腐之风,撰文指出在民穷财尽、哀鸿遍野的中国,这种穷奢纵欲之人“实为国民的罪人”“何得有此丧心病狂的举动”^②。他坚决驳斥媚日求和的软弱之举,对一些腰杆挺不直的媚日分子和一些丧失民族气节的做法深恶痛绝、口诛笔伐。他坚决反抗国民党摧残打压进步文化事业之措,面对国民党当局对他的出版事业的“赶尽杀绝”,他从不妥协。封停一刊,就新办一刊,此地查封,就去他处继续,邹韬奋致力于让进步文化事业继续“进步”,激浊扬清,发挥舆论的斗争作用。

三、矢志不渝、奉献终身的敬业精神

邹韬奋认为书刊出版经营的根本“是在刊物的内容”。他主张内容鲜活真实、有吸引力,文风笔风明快畅达、精炼实用,要求文章富有知识性、价值性、趣味性,实实在在传递信息与资讯,能够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其一,肩负出版使命,堪称“出版事业的楷模”。邹韬奋热爱新闻出版事业,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注重“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引导社会大众向上、向前奋进。他将个人气度融入刊物品性,不卑不亢,不屈不挠,为祖国文化事业积极奉献。其二,内容求真求新,文风简明畅达,编校严谨认真。在内容的真实和价值方面,邹韬奋往往认真研究、仔细求证,追求内容的审慎精细,强调“宁缺毋滥”。在他创办的刊物、撰写的文章中,既有深入大众生活的日常话题,也有关于社会事件的深度时评。在文风方面,邹韬奋提倡简明、畅达、通俗、易懂的目的是让普通大众都能阅读。在编校方面,邹韬奋亲力亲为,力争不出一个错字。其三,注重与读者的沟通交流,与作者结成“良友”共同进步。邹韬奋通过刊物建立了“作者—编者—读者”沟通的桥梁,与双方畅谈感言。邹韬奋格外关注读者意见,诚恳虚心接受批评和建议,读者来信必复,尽力为读者排忧解难。邹韬奋在抗战期间抚民心、吹号角、解疑惑,尽到了“文化工作者”的一份力,起到了动员、教化的宣传作用。

总之,对国家、民族的深沉之爱是邹韬奋可歌可泣、令人钦佩的精神原点,他百折不挠扎根出版事业、负重前行、奉献终身的精神丰碑为当代出版业提供了精神指引和行动遵循。当前,出版领域面临社会舆论环境形势复杂、出版物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舆论斗争能力出现分化、技术发展调整行业形态等挑战。随着我国文化强国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出版业应当以韬奋精神为鉴,明确自身“举旗者”“工程师”“斗争者”“秉烛人”的行业定位,主动跟进、积极作为。

第一,做引领思想的举旗者。历史经验证明,“只有思想上精神上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才是内在的强大的持久的。”^③出版业要勇担引领思想的举旗者的时代大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思想和方向不动摇。出版业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原点,坚持文化自信,发挥好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阵线的喉舌和工具的作用,助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坚持与时俱进,以先进思想文化引领社会发展进步,助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第二,做精神建设的工程师。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牵住出版物内容质量这个“牛鼻子”。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这一“主线”,紧紧守牢内容导向正确“底线”,一以贯之坚持出版业“培育和践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唱响主旋律”这一根本。学习借鉴邹韬奋“启迪理智能力,增富知识见闻”的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将知识性、价值性、趣味性有机统一于实实在在的信息与资讯。以人民为中心,坚守质量底线,出版优质内容,做好知识传承的“守门人”和“把关人”,“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383页。

②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增补本)3》,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598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24版,第13页。

给人民”^①。

第三,做坚守原则的斗争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提高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出版业要勇担坚守原则的斗争者的时代大任,^②坚持党性原则,掌握舆论主导权,将舆论作为斗争的有力武器。纵观百年历史,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舆论都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邹韬奋作为新闻出版舆论阵线的一员,将舆论阵线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不屈于权贵,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那个年代里引导民众揭露真相、明辨是非,激励、鼓舞了大量有志之士走上思进步、谋复兴的救国之路。如今,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必须要发挥好舆论“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③的功能,巩固提升出版行业的舆论斗争力。

第四,做敬业奉献的秉烛人。以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为己任,敬业奉献,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邹韬奋认为“尽一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到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与邹韬奋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出版业拥有良好的行业环境,尤其拥有人工智能、信息技术、工业技术等先进技术工具,但也面临人才流失、码洋下降、市场不足等新挑战。我们应当学习邹韬奋先生“将每一本出版物办得有血有肉”的赤诚与执着,激发踏踏实实干事的精神力量。以提灯秉烛的探索和奉献精神,挖掘出版融合与转型发展的内在规律,积极思辨,谋新谋远,主动探寻新时代出版事业高质量发展之路,为促进文化事业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论韬奋精神的文化蕴含

张 乐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广东 肇庆 526020)

2025年是伟大的文化战士邹韬奋先生诞辰130周年。韬奋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是从邹韬奋先生其人其事中提炼并升华的文化精神。深入挖掘韬奋精神的文化蕴含,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和培育具有中华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时代新人提供内容支撑。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每个人的思想毫无例外都受到一定文化持久而深刻的影响。邹韬奋先生在成长为一名杰出的文化战士前,离不开自身丰厚的文化功底,也离不开文化力量的滋养。本文将从韬奋精神的文化渊源和韬奋精神的文化主体性特质两个方面来阐述韬奋精神的文化蕴含。

一、韬奋精神的文化渊源

首先,韬奋精神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了丰富的养料。邹韬奋先生有过近十年的私塾学习经历,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并且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贯穿了其学习成长过程。邹韬奋先生早在新加坡公学和圣约翰大学求学时期,就把《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王阳明全集》以及唐宋八大家的各个专集都完整阅读过。传统文化的精髓在于其蕴含的德性能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青年韬奋崇德修身的重要思想根源。一方面,扎实的传统化学养提升了邹韬奋先生的文化素养,为其后来提升新闻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2025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24版,第81页。

② 同上,第75页。

③ 同上,第71页。

出版业务能力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下为公、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等思想观念,对青年韬奋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养成具有重要影响,帮助他强化了“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和担当精神。邹韬奋先生对孔子、王阳明等圣贤的思想推崇备至,认为“孔子,古之圣人也,挽既溺之世风,传一线之道绪,东亚道德赖其维”“王阳明,近世之大儒也,悟格物致知之学,倡圣贤良知之旨,振人心之萎靡,惠后进以无穷”。^①因此,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底蕴的韬奋精神,能够为新时代青年的健康成长提供充分的文化养料和文化力量。

其次,韬奋精神在革命与战争实践中锻造了革命文化属性。邹韬奋先生出生和成长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受革命文化影响深刻,因而韬奋精神本身带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气质,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救亡图存历程中坚定的理想信念、彻底的服务精神以及顽强的斗争勇气和智慧。“自‘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我竭尽我的心力,随同全国同胞共赴国难;一面尽量运用我的笔杆,为国难尽一部分宣传和研讨的责任,一面也尽量运用我的微力,参加救国运动。”^②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劳苦民众的立场为出发点,成为宣传抗日救亡的最重要舆论工具。1938年,他主办的《全民抗战》三日刊特别编印战地版,直接面向部队,提升战士的士气和文化素养。毛泽东曾以“我们干革命有两支队伍,武的是八路军,文的是邹韬奋在上海办刊物、开书店”^③对邹韬奋的文化抗日贡献给予高度评价。除舆论作用外,《生活》周刊还利用读者捐款开办“伤兵医院”,参与战时后方服务,根据前线需求采购物资。邹韬奋先生始终保持革命的一股劲、一股气,“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绝不屈服,”^④彰显出排除万难、无私无畏、宁死不屈的革命斗争精神。新时代传承和弘扬韬奋精神是发扬中国革命文化的应有之义,为激励当代青年坚守理想信念、主动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提供精神力量。

最后,韬奋精神以外来先进文化为补充,助力其获取观察世界、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邹韬奋先生精通外文,使他可以在外求学期间直接获取国外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从大量的外文书报中获得对各国历史文化、地理概况和风俗人情的认识,同时也加强了他对各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了解。1922年邹韬奋先生加盟以“教育救国”为核心办刊理念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开始从事职业教育相关研究。当时职业教育在西方已有了充分的发展,他阅读大量与职业教育相关的英文著作,充分汲取国外职业教育先进经验,翻译出版了《职业智能测验法》《职业教育研究》《职业指导》等书籍,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邹韬奋先生主编《生活》周刊时,经常刊登世界各国文学名著、艺术作品,并介绍在新兴科学技术、政治等不同领域的杰出人物,如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德国政治家史特莱斯曼等,极大地开阔了国人眼界。邹韬奋先生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最终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主要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和影响。流亡期间,他去多国考察,其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伦敦,他深入考察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与真实社会状况,并系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柏林,他具体考察德国政治与经济状况,见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后,心中更加充满对献身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豪情;在苏联,他亲眼看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成果,深受触动并心向往之。邹韬奋先生外出学习考察的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致,而且也必定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⑤。邹韬奋先生的革命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下变得更加清晰且坚定,最终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转变,并在回国后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

二、韬奋精神的文化主体性特质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自强的根本依托,不仅体现在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传承发展的自觉意

① 参见聂震宁:《邹韬奋先生的阅读与信仰》,《人民政协报》,2023年8月7日第1版。

②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版,第85页。

③ 参见傅建芬、蔡静:《永远年轻的邹韬奋》,《人民周刊》,2017年24期,第80~81页。

④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488页。

⑤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221页。

识上,还体现在以胸怀天下、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自主选择、吸收借鉴外来文化资源的能力上,是本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根本特质,具有鲜明的独立性、自主性、创新性。有了文化主体性特质,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韬奋精神的文化主体性特质蕴含在邹韬奋先生的文化工作实践和其思想体系中。邹韬奋先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引,扎根中国具体实际,在艰辛守护和顽强斗争的革命中传承中华文脉,并最终确立了为大众的文化立场。韬奋精神的文化主体性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韬奋精神深刻蕴含着保持中华文化定力、追求真理的主体性。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后,邹韬奋先生并未止步于理论本身,而是将其转化为观察国家命运、探寻救国方案的科学方法,他相信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邹韬奋先生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深刻分析“中华民族的出路怎样?”“如何争取生存权?”等根本问题。此种选择与结合,是基于中国具体实际,以近代中国面临的问题为导向,充分彰显出韬奋精神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主体意识。二是韬奋精神彰显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自觉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韬奋精神的沃土,邹韬奋先生经常将古书之义和现实社会相关联,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韬奋精神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等思想观念,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传统文化精神发扬光大。在革命战争年代,邹韬奋先生将“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的传统理念,创造性转化为《生活》周刊“能尽其心力为社会多争些正义,多加些光明”^①的独立办刊原则和斗争精神。同时,邹韬奋先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以百姓心为心”“为生民立命”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观点相结合,升华为“永远立于大众立场”^②的新闻观和“竭诚为读者服务”^③的精神信条。邹韬奋先生不遗余力地为大众服务,坚持“拿钱来办有益大众的事业,有益大众的福利”^④“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⑤,这既是传统民本、仁爱思想的体现,也是其蕴含的无产阶级文化特色的鲜明表达。

邹韬奋先生贯通古今、融汇中外,是令人景仰的文化巨擘。他以在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没有文化主体性,文化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无文化自信可言。作为中华文化的精神宝库之一,韬奋精神以其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自觉意识、坚持独立自主的办刊原则、坚持推动文化创新的主动精神坚守了中华文化主体性,充分展现出中华文化的生命力。

面对新时代、新征程,传承和弘扬韬奋精神,引导青年深刻理解中华文化的内涵品质与价值追求,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培育具有文化主体性意识的时代新人。与此同时,韬奋精神中蕴含的理想信念、文化自觉、大众立场、奋斗精神、担当意识等优秀品质,也为培育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新人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养料和价值引领。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393页。

② 参见邹韬奋:《韬奋自述》,学林出版社2000版,第154页。

③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版,第61页。

④ 参见邹韬奋:《萍踪寄语: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版,第206页。

⑤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57页。

Rich Connotation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aofen Spirit (by Writing)

HAN Qingxiang, XIAO Weiguang, LONG Jie, ZHANG Yuhui, WANG Yuheng, ZHANG Le

Editor's Note: The year 2025 marks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ou Taofen. Zou Taofen was an outstanding publisher and journalist, a distinguished political commentator, a great cultural warrior, a pioneering youth leader, a staunch patriot, and also a glorious memb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onor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glory of our Party”. Chairman Mao Zedong succinctly summarized the Taofen Spirit: “Loving the people, sincerely serving the people, dedicating himself wholeheartedly until the very end—this is the spirit of Mr. Zou Taofen, and this is what makes him so moving.” The Taofen Spirit is a treasure: a treasure in the fields of journalism and publishing, cultural resistance during wartime,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It still hold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our current efforts to build a culturally strong nation, making it worthy of re-examination,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vigorous promotion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To commemorate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Zou Taofen's birth, we have invited the following experts to contribute to this column: Han Qingxiang, a first-class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National Academy of Governance) and the leading expert of the Expert Studio at the Party School; Long Jie,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Taofen Foundation, Executive Dean of the Taofen Research Institute, and Editor-in-Chief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Xiao Weiguang,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the guiding teacher of the Youth Lecture Team for the Taofen Spirit, and a former senior editor at the Theory Department of People's Daily; Zhang Yuhui, the Secretary of the Youth League Committee at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nd the leader in charge of the Youth Lecture Team for the Taofen Spirit; Wang Yuheng,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nd editor at the Ningxia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Zhang Le, a young teacher a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and one of the authors of *Echoes of the Taofen Spirit in the Modern Era: A Collection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search*. They explore from perspectives such as Zou Taofen and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aofen'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nd his thoughts on cultural enterprise management, Zou Taofen's practices in ide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youth,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Taofen Spiri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contemporary publishing industry, and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Taofen Spirit. Our aim is to contribute to the revelation of the rich connotation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Taofen Spirit.

Key words: Taofen Spirit; cultural subjectivity; entrepreneurial spirit; management thought; youth development; publishing industry

(责任编辑:傅 游)

(上接第 7 页)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the Others” in Heidegger's Fundamental Ontology: A Response to the Critique of the “Violence of Being”

XU Yinfei

(School of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Levinas repeatedly criticizes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totality, represented by Heidegger, for its suppression of and violence toward the Other (l'Autrui). Yet, Heidegger's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 among “Dasein-the others (die Anderen)-the they (das Man)” reveals that the others also possess an independent and authentic dimension. By analyzing the negative nature of “being-with” (Mitsein), in which “the others are the they” and “the they are Dasein”, and contrasting it with Levinas' attribution of priority to the Other, we can not only uncover their theoretical tensions on the ontological and ethical levels, but also highlight their potential complementarity in their pursuit of individual emancip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Key words: being(Sein); Dasein; the others (die Anderen)/the Other (l'Autrui); the they(das Man); ethics

(责任编辑:傅 游)